

由文入史：从缪钺先生的学术看文辞修养对 现代史学研究的“支援”作用

王东杰

(四川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4)

摘 要：缪钺先生的学术风格以“文史结合”著称。从史学研究观点看，“文史结合”最重要的核心是将文辞视为一种考证工具（而不仅是史料）。从中国现代学术文史分途的发展过程看，缪先生的学术风格并非“主流”，然绝非特例。一批经历与之相似的学人的事例表明，在现代史学与传统学术关联的意义上，除了“由经入史”外，还存在一条“由文入史”的道路。深厚的文辞修养在五个方面对他们的史学观念和现实提供了支援作用：对“人”的关注、对人情感世界的注意、“了解之同情”的研究方法、对历史“意义”的发掘、对传统文化的“温情与敬意”。

关键词：文史结合；由文入史；现代学术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 (2014) 06-0031-13

缪钺先生以文史并擅名家，而他也同时把历史与文学视作自己的专业。^①文史并论，古来如此。然现代学风崇尚专门，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后，学者多立定一科，各守藩篱，分头并进，文史兼长者遂不多睹。时至今日，学人乃有文史“是两种不同的行当，犹如两座不同的高山”之感。^②职是之故，缪氏兼通文史的治学风格更显殊异，屡为学人阐发。^③在这篇文章中，我首先从史学研究角度揭示缪先生所言“文史结合”的具体内涵，再简要对此路径的形成原因作一推论。在此基础上，结合其他一些类似事例，将此个案放在整个中国现代学术风气转移的大背景下，观察其意义所在。我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传统的文辞修养对现代史学研究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一、史学研究视野中的“文史结合”

缪钺先生“文史结合”的学术路径，如何理解？前人多揭明以下几层意涵。一是指其研治的学科，既有文学（包括文学史），又有史学；在研究历史人物与著作时，无论其是否以文学出名，也往往注意到其在文辞方面的造诣。比如，他在探究《吕氏春秋》一书的撰述时，就关注了各篇之作法、结构，并特别提出其措辞的“蕴藉”、“含蓄”。重要的是，这些讨论并非浮词，而是研讨此书撰述情形和思想系统的依据。在一篇研究东晋南北朝语言社会史的论文中，缪先生又留意了六朝人的声调与措辞之美。^④二是指缪先生对学术论文的修辞给予了特别关注：他称颂王国维、陈寅恪的文章有“灵光奇气”，“能引起读者遐思遐想”；提倡历史论文“不妨含有文学情趣”，自己的论著亦以文辞清美著

作者简介：王东杰（1971—），男，河南濮阳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① 缪钺《自传》，《缪钺全集》第7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71页。

② 柯建中：《缅怀缪钺先生》，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魏晋南北朝史论文集》，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44页。

③ 刘琳：《缪钺先生的治学道路与学术特色》，钱鸿瑛：《缪钺与中国古典诗词研究》，均收入四川大学历史系编《冰茧彩丝集》，成都：成都出版社，1994年，第6-9、31-36页。

④ 缪钺《〈吕氏春秋〉撰述考》、《六朝人之言谈》，《缪钺全集》第1卷，第51、336-337页。

称;同时又注意教育学生怎样作文。^①从中都可看到文学修养在其学术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对我们的论题来说,“文史结合”更重要的内涵体现在历史认识方面。缪氏晚年为《全宋文》所作序文中说:文集内容繁复,“举凡国计民生、世情风习、说经考史、论道参禅、仕宦升沉、山川游览、遗闻轶事,以及文学艺术之评赏,罔不涉及”。或“可与史书互证而订其失误”,或“可以补史书之阙遗”,“更有诸作者发抒内心深处之情思,反映一代心声,而只记表面事迹之史书无能为役者。故文集之作用,固不得仅以词章目之”。^②其对“文史结合”最精要的解说则莫过晚年所言:“研究古代某一作家的作品与生平,必须熟习当时的历史背景才能深入,此即所谓知人论世;而研究历史,如能联系文学作品,探索当时人的‘心声’,则对于问题往往能有深刻而新颖的看法。”^③分别站在文学和史学立场,阐发了它们各自对对方的助益。

单就史学而言,在这几段话中,缪先生主要是从“史料”角度理解“文”的价值的。其中又可分两层:一是外在的、物质性或社会性事实的记录,二是内在的、时人精神世界的记录。后者被称为“心声”,尤受缪氏重视,因其展示了文学作品无法为其他史料替代的价值。对一般的历史学者而言,从外在事实方面理解和利用文辞著作,在实践中虽不易办到,在认识上并无困难;而把文辞视为“心声”史料的学者,则少之又少。

以上这些是过去学者提到较多的。此外,我也注意到,诗文修养对缪先生的史学研究所起的作用还有一更深层次。在这个层次上,文辞不但为史学研究提供了材料,其本身就成为历史考证的工具。

在1940年代的一篇论文中,缪先生注意到《荀子·乐论》与《公孙尼子》有相近之处。由于公孙尼子生活时间在荀子之前,就引发一个问题:前者是否因袭自后者?这是一个典型的考据学问题。为此,缪氏引用了《荀子》中好几处排墨之语,下断语曰:“公孙尼子之时,墨学尚未兴,或初起,公孙尼子决不致作此等语;若谓此等语乃荀子袭取公孙尼子时所加,然就篇中文脉观之,极为自然,又不似强插入者。”篇中又据“《乐记》诸节文辞与荀书大同小异者”加以比较,发现无论是“文意衔接”的紧密度,还是层次和语义的清晰度,“皆荀书辞义为长”,故断言《荀子·乐论》“似为原作”,《乐记》则从《荀子》抄录。^④这两例皆举“文脉”、“辞义”为证,非文学修养极高者不能为。

另一例是他给郭沫若《屈原研究》所写书评。郭氏据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屈原放逐,乃赋《离骚》”一语,论断《离骚》写于屈原被放逐之后。缪氏认为《离骚》“乃抒情之文,此段借用古事以明发愤著书之义,有如诗中之比兴,作者固不必拘于事实,读者亦不可据为实录”。类似情况还有考释陶潜是否曾宣布“不为五斗米折腰”而去官归田一事。由于《归去来兮辞序》有“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的话,有人怀疑此事靠不住。缪先生则认为,古人作文贵含蓄,此《序》中的话乃是“托辞”,只是“表面上的原因”,故我们不能执著于字面意思来判断陶潜真意。在另一篇文章中,缪先生批评有人据梁武帝诏书中的“巢南”二字论断南朝汉人多有逃往南岭地区者,实由完全不知此二字系用典之故。^⑤

在这几例中,缪先生所依据的都是自己对文体性质和辞章内在组织方法的理解,和一般印象中对名物制度之类的“考据”有很大差异。前两个例子展示了“文法”(此二字用古义,非今日“语法”之谓也)怎样为史实判断提供支撑,后三个例子展示了学者因不明辞章性质而误下断语的情形,分别从正反两面揭示了利用文辞进行考证的潜能与限制。缪先生文辞修养极高,拥有丰富的诗文创作经验和理论思考,故可灵活透辟地深入诗文内部,不致因拘泥文字而死于句下,发生所谓“控名责实,

① 缪钺《要言不烦》,《缪钺全集》第7卷,第105页;景蜀慧《殷殷滋兰意》、吕一飞《缪钺教授谈写文章》,均收入四川大学历史系编《冰茧彩丝集》,第83、87-92页。

② 缪钺《〈全宋文〉序》,《缪钺全集》第7卷,第45-46页。

③ 缪钺《治学琐言》,《缪钺全集》第7卷,第74页。

④ 缪钺《〈吕氏春秋〉中之音乐理论》,《缪钺全集》第1卷,第83-84页。

⑤ 缪钺《评郭沫若著〈屈原研究〉》、《陶潜不为五斗米折腰新释》、《南朝汉人逃往少数民族地区的问题》,《缪钺全集》第1卷,第92、16、208页。

变而为望文生义”的情形。^①相反，文辞与考证在缪氏笔下互为援奥，相得益彰；辞章不仅没有阻碍考证，反而极大扩张了考据的疆域。而这一做法也突破了一般所谓“文史互证”的层次：那主要是从史料方面思考文辞的价值，关注的是其内容；这里则是把“文法”纳入考虑范围，远非内容所能局限。

缪先生曾说，颜之推利用上下文义校勘古书时的方法乃“校勘中更高一层的方法，清代许多著名的校勘学者都是经常用这种方法的”。^②这使我们看到，缪氏对利用文辞进行考证的方法抱有深刻自觉。同时，它也向我们表明，这种研究方法渊源有自，缪先生这一认识来自中国自身的学术传统。简单说，中国本有两种不同的考证路径：一是“辨名物”，一是“审辞气”。缪氏以文考史的方法，显然从后者吸取了灵感。对此，我们从其引用的文字中，可以找到许多证据。如朱熹据文章风格判断《书·序》非孔安国作，因“汉文粗枝大叶，今《书·序》细腻，只似六朝时文字”。^③又如清人汪中（容甫）提出：古人文辞有“曲”与“形容”两种方法“名物制度可考也，语可通也”，而“曲”与“形容”二者，“非好学深思莫知其意焉”。^④又如陈寅恪所言：“文人才女之赋咏，不必如考释经典、审核名物之拘泥”；“才子词人之文章，绝不应拘执考据版本家之言以绳之也”。^⑤古今一线，未尝断绝，不难发现缪氏思路的源头所自。

缪先生云：“最佳之考证仍需运以空灵之思，闳通之识。”^⑥“空灵”二字，既是他所推崇的文章风格（如前揭对王国维、陈寅恪的评语），又是他所推崇的学问境界。缪氏曾论王国维“心中如具灵光，各种学术，经此灵光所照，即生异彩。论其方面之广博，识解之莹彻，方法之谨密，文辞之精洁，一人而兼具数美，求诸近三百年，殆罕其匹”。有之，惟汪容甫差与相近。^⑦此文为夏承焘注意，夏氏更将文意概括为“王静安以词学治朴学。此柔厚芳洁之情，可推之以立业绩学”一语。^⑧在此意义上，史学的价值不惟“求真”，亦兼“审美”。至缪氏以王静安拟汪容甫，亦再次透露这一观念与传统学术血脉相接。按汪中曾言：“记诵之学，无过人者，独于空曲交会之际以求其不可知之事，心目所及，举无疑滞，钩深致隐，思若有神。”^⑨为缪氏一引再引，盖正是其自期，亦其性情所向者。惟既是“空曲交会之际”，何由知其所“不可知”？必当以灵思锐感深入文脉，方能听闻古人隐微之“心声”。

“闳通之识”亦与文学修养有关。缪先生长于文章，对言辞运用具有高度敏感。他在《清谈与魏晋政治》中注意到《南齐书·王俭传》记俭谓谢安为“江左风流宰相”一语，谓“大可玩味”：盖“‘风流’与‘宰相’二词，义本相远”，宰相有经国之责，雅不应以“风流”二字加之。今王俭有此看似矛盾之语，正透露一个时代思想风气转移的消息，可据此看到“魏晋以来清谈家所理想之政治家之新范型”。^⑩这又是一个以辞章做史料的例子，而远超史事考据范围，成为具见史识的大判断，用传统的术语说，即是“义理”也。

陈寅恪先生尝言，中诗西诗传统不同。西诗之佳者多论哲学与宗教，中诗则多讲“实际的环境，个人的状况”，可以清楚见及时、地、人的情形，足补正史所缺。^⑪缪氏论诗，也极重“时代性”，意

① 引语出自钱钟书《谈艺录》（补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36页。

② 缪钺《颜之推的文字、训诂、声韵、校勘之学》，《缪钺全集》第1卷，第357页。

③ 缪钺《宋代文化浅议》，《缪钺全集》第1卷，第430页。

④ 缪钺《“烦琐考证”辨析》，《缪钺全集》第7卷，第153页。

⑤ 缪钺《“淮阳”与“雒阳”》，《缪钺全集》第7卷，第230页。

⑥ 缪钺《考证、批评与创作——敬悼朱佩弦先生（自清）》，《缪钺全集》第7卷，第108页。

⑦ 缪钺《王静安与叔本华》，《缪钺全集》第2卷，第195、200页。

⑧ 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1947年1月8日，《夏承焘集》第6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664页。

⑨ 缪钺《治学琐言》、《治学补谈》、《治学经验漫谈》、《自传》，《缪钺全集》第7卷，第75、80、84、172页。

⑩ 缪钺《清谈与魏晋政治》，《缪钺全集》第1卷，第147页。

⑪ 陈寅恪讲授、刘隆凯整理《陈寅恪“元白诗证史”讲习侧记》，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4页。

即能从中看出“一诗人所处之时代,大之国势朝政、世风民俗,小之一己所经、生活情况”之“与古人不同”之“特异之点”。^①有此要求,“诗”即成“史”,解诗便须论世。而缪先生运思于文史之间,也每能恰到好处。如孙次舟先生曾据皮日休的一些作品,判断皮氏出身农民家庭。缪先生则认为,皮日休确实有描述耕耘之作,然“这些作品只能说明皮日休少时家庭经济并不很宽裕,且亦曾下田耕作,而并不能作为他是农家子弟的证据。因为古时文人作品中自述贫苦,常是以士大夫的经济生活为标准,而不是以农民的生活为标准,并且作诗又多用夸饰之词与象征、比兴之法,非尽科学性的实录”,且“地主子弟偶尔参加耕作,也是常事,他们也乐于提到,因为中国自古重农,从事耕稼并非可耻”。^②这段话予人以三层启示:一是有分寸地把握诗句的语义,二是准确认识文体的性质与做法,三是依据诗人自身的文化价值取向理解其意指。这就不仅是要懂诗,亦要知世,方不被字句表面意思所瞒。而其中提到贫困的“标准”问题,更可看到解诗者自身的“时代性”:社会科学为一个敏锐的文史学者提供了新的问题意识和认知范畴,也开启了更为丰富的文本解读空间。

二、“文史结合”路径的形成

以上从史学研究视野出发,分析了缪先生“文史结合”说的几层内涵。本节试着探索此一路径形成的原因与机缘。大致看,有几个因素不可忽视:一是个性所钟,二是家世传习,三是地域文化,四是师友切磋,五是学术环境。

缪先生论学,最重个性,尝言“个性”亦是构成学者思想的因素之一。^③故我们不妨循此指示,先从其个性因素入手。叶嘉莹教授说:缪先生具有“诗人之稟赋”与“学者之修养”。^④是也。前者属于天性,后者由培植而成,诗人稟赋灌注于后天学养之中,自具灵光。犹有进者,缪先生似乎还具有两种气质,一是清简,二是细腻。前人论南北朝学问,有“南人约简”、“北学深芜”的品评,缪氏自认学问与文章接近南方。这在治学上,表现为“适可而止”的行文习惯;在书法上,表现为“萧散隽逸”的美学追求;在日常行为中,表现为“案无留牍”、秩序井然的景致。^⑤缪先生亦是一心思曲折细密的人。他把中国诗人分作两类,一类“入而能出”,以庄子为代表;一类“往而不返”,以屈原为代表。“入而能出者超旷,往而不返者缠绵”。^⑥其中,缪氏性情似更偏于后者。他所特致敬意的诗人如曹植、杜甫、李商隐、黄仲则、龚自珍、王静安等,皆系“屈原型”(当然,他同时也欣赏能够超远的陶潜),声应气求,从中不难发现其本人个性。在学术方面,这特别表现为对古人幽微心态及曲折史事的抉发(如讨论陶潜辞官的原因)。整体看,缪先生的行事、文章和学术品味,皆与宋明以降士人的理想性格若合符节,代表了他的文化身份认同。

缪先生出身书香门第,从小受到良好的文史训练,掌握了一些基本的治学方法。在辞章方面,他自称最爱魏晋文章的“淡雅隽逸,起止自然”,便是家庭熏陶所致。而他后来谈及论文写作时又说:“我们小时候读书受教育,并不谈做学问,而是先反复训练写文章。”^⑦在传统学问脉络中,写文章实即做学问的初步训练。

地域文化因素也应一提。缪氏虽祖籍江苏溧阳,却生长于河北。尽管河北地区毗邻帝都,但有清一代,学界几乎不见朴学影响。^⑧晚清桐城派大师吴汝纶和张裕钊皆曾执教保定莲池书院,吴氏任教时间尤长,对直隶学风和文风产生了极大影响。徐世昌曾列举八位晚清桐城派文章大家,直隶人便占

① 缪钺《龚自珍诞生百四十年纪念》,《缪钺全集》第2卷,第188页。

② 缪钺《再论皮日休参加黄巢起义军的问题》,《缪钺全集》第1卷,第389-390页。

③ 缪钺《论荀学》,《缪钺全集》第1卷,第42页。

④ 叶嘉莹《论缪钺先生在诗词评赏与诗词创作两方面之成就》,四川大学历史系编《冰茧彩丝集》,第16页。

⑤ 刘琳《缪钺先生的治学道路与学术特色》、景蜀慧《殷殷滋兰意》,四川大学历史系编《冰茧彩丝集》,第11-12、78页;缪钺《自传》,《缪钺全集》第7卷,第175页。

⑥ 缪钺《论李义山诗》,《缪钺全集》第2卷,第131页。

⑦ 缪钺《要言不烦》,《缪钺全集》第7卷,第105页。

⑧ 缪钺《马绍伯墓志铭》,《缪钺全集》第7卷,第106页。

了半壁江山。^① 缪钺中学时期的国文教师之一即吴汝纶再传弟子，稍长又与吴汝纶高足籍忠寅交往，时受启迪。故缪氏本人虽对桐城古文的作法不甚满意，^② 然也掌握了桐城义法，表示从中得益不少，学会了“言之有序、文辞清畅”。^③

就这些因素看，缪钺年轻时打下的学问基础，基本不出传统文史之学的范围，其中又特以辞章为主。故早在中学期间，他便以诗词写作杰出同侪。^④ 1923年8月，缪氏考入北京大学文预科；惟因父亲病重，不到一年就回到保定，担任中学国文教员，达十余年之久。此一机缘，也奠定了其后来相当一段时间以文学为主的治学格局。

如果缪氏一直待在保定，则可能终身只是一地方性读书人。不过，随着交往圈子的扩大，他的事业也开始发生一些转机。缪钺的名字首次出现在全国性报刊中是1926年7月，第59期《学衡》杂志节录发表了他致编者的信函，赞赏《学衡》的理念，抒发“声应气求”之意。次年2月21日，缪氏又致信《甲寅周刊》主编章士钊，旋被刊出。而此时远在东北的金毓黻，正是从这封信中知道了缪钺的名字，许其所论“精当之至”。《学衡》与《甲寅周刊》是两个著名的“反新文化运动”刊物，缪氏主动与之联系，鲜明表达了自己的文化立场。而他之所以成为一个具有全国性声望的学者，也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吴宓等人的提携。1929年，《论诗》在《学衡》刊出，是他第一篇正式发表的论文。他早期的几篇文章，如《曹植杜甫诞生纪念》、《龚自珍诞生百四十年纪念》、《顾亭林诞生三百二十周年纪念》、《黄仲则逝世百五十周年纪念》等，都发表在吴宓主编的《大公报·文学副刊》中。在吴氏接引下，缪氏学侣圈子逐步扩大。1933年，吴介绍其与郭斌龢相识。次年起，缪氏便开始在南京《国风》半月刊上连续发文，又出版《元遗山年谱汇纂》，皆出自郭氏推荐。^⑤ 更重要的是，与吴、郭的交往也彻底改变了缪先生的治学环境。尽管1930年和1935年，缪氏先后在其他友人帮助下，出任河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和广州学海书院教授，但两次皆不足一年。直到1938年底，经郭斌龢邀请加入浙江大学中文系，才在高等教育界站稳脚跟。

在社会地位上，那时大学与中学教师的差距并不大，但从学术条件看，大学显然要优越很多。^⑥ 具体到缪钺先生，所谓学术条件尤其指学者间的切磋在论题、思路方面的启迪作用。正是进入浙大以后，缪氏治学方向开始发生一些重要变化。此前他的著作几乎全部集中于文学领域，但自1940年代开始，其研治范围极大扩展。此期发表的论著，尽管不少仍属文学和文学史方面，但如《周代之“雅言”》（1941年），《何晏王弼事辑》，《读〈晋书〉札记》、《尚书郎——南朝官职杂释之一》、《读〈魏书〉札记》（1942年），《读〈二程全书〉》、《六朝人之言谈》、《与钱宾四书——论战国秦汉间新儒家》、《论荀学》（1944年），《先秦书中孔老关系诸史料之检讨》、《〈吕氏春秋〉著述考》、《〈吕氏春秋〉中之音乐理论》（1946年），《正始清谈家对于政治之态度》、《与友人论〈墨经〉撰著时代》（1947年），《清谈与魏晋政治》（1948年），《东魏北齐政治上汉人与鲜卑之冲突》（1949年）等，基本属于史学论著。

缪氏治学重心从文学转向文史并重，一方面是其学术理路内在倾向的发展结果。如前所述，中国诗本来就有重史的传统，要了解一个人的诗，须先了解其所处的时代和个人际遇。故在1930年代，缪氏就发表过《鲍明远年谱》（1932年）、《元遗山年谱汇纂》（1935年）一类著述。1937年5月，

① 徐世昌：《贺先生文集叙》，贺涛《贺涛文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页。

② 吴宓有缪钺“痛斥古文”的记录，参见吴宓《吴宓日记》第9册，1944年10月12日，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351页。

③ 缪钺《要言不烦》、《追忆三位中学老师》、《纪念籍忠寅先生》，《缪钺全集》第7卷，第105、113、114页。

④ 缪元朗《缪钺先生编年事辑》（以下简称《事辑》），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6页。

⑤ 缪元朗《事辑》，第9、11-12、25、21页。

⑥ 杨树达在1920年5月抱怨“历年在湘任教国文，以改作文卷为苦役。……居京数月，见诸任教大学者每周授课不过八、九时，自修时间绰有余裕，每心羨之。”见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与《积微居诗文钞》合刊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3-14页。这一状况在30年代也并无根本改变。而教课钟点的差别还只是一方面。

在给龙榆生的一封信中,他说自己“近读唐人集,兼治唐史,诗史互证,时有所获”。^①这是清楚的自述,可见他采取文史互证之法是有意识的。后来其史学研究重点实际集中在魏晋南北朝一段,也是他爱好魏晋文章的自然延伸。其注重荀学,也可以看到汪中的影子。另一方面,我们也应注意到,缪先生的“史学意识”原本就很强。1936年7月,他对吴宓说,郑玄注经“多针对当时实情而为议论,应以史事与注对读,方合”。^②直是经史互证,极有启发。追溯其思想来源,似乎也应与文史互证的治学经验有关。

在晚年一篇人生总结性质的文章中,缪先生对自己的学术生涯有如下描述:“我的科学研究重点,早年是先秦诸子,曾撰文提出对于荀卿之学及战国秦汉新儒家的新见解。后来转向汉魏六朝唐宋时期的历史与文学。”^③这段话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缪氏将自己的学术发端定在1940年代的先秦诸子研究,言下之意是不把此前发表的文章视作学术著作,至少也认为不重要。这再次提示我们,大学这一现代机构在缪氏学术生涯里的重要性:对他而言,正式踏入大学任教,才算作“科学研究”之始。其次,缪先生提到的论荀卿和战国秦汉新儒家的两篇文章,分别是1944年7月发表的《论荀学》和同年6月发表的《与钱宾四论战国秦汉间新儒家》。两文发表时间相近,论旨相接,且都与钱穆有关。后者直接点明与钱氏商榷之意,而大体是在接受钱说的前提下进行的;前者亦援用了钱氏的论点。这些显然和这年春天他与钱穆的交流分不开。^④易言之,其学术重心的转变也是其交游圈子扩大的结果。

在当时的史学界,钱穆是个大体能被主流容忍却并不受喜欢的角色;其文化观念有不少与缪钺相近的地方(详后),和缪氏友人圈子中的其他人,如刘永济等,也是同调。更应注意的是,缪氏友人中,还有不少史学“主流”圈子中的人。所谓“主流”,我指的是在学术体制内占据主导地位的中研院史语所一系学人及与他们的学术格调与取向相近的学人。

缪先生早在河南大学时代就结识了刘节,广州学海书院时期又开始与谭其骧交往,彼此留下不少论学记录。又从缪氏通讯可知,至迟从1939年起,他已和史语所的陈槃有了书信来往,嗣后鱼雁不绝,并进而与劳幹通信。这些书简有不少都是专门研讨历史问题的。在1942年致陈槃的一封信中,他更对史语所的工作表示钦敬,谓其“十余年之努力,于中国学术有建立标准之功”。这当然不排除客气成分,然大体应是认真的。若我们考虑到他和“学衡派”学人的亲密关系,此一态度尤应注意。盖在一般印象中,“学衡派”和史语所可说是两个完全相异的学人社群,在文化观念上更不无冲突。这一认识并不准确(甚至可说误解居多),但也非空穴来风。故缪钺此言表明其至少在治学“标准”方面自觉地向史语所的“新学术”迈进了一步。此外,缪氏早期教中学时的得意学生胡厚宣、王崇武,及学术联系密切的妹婿杨联陞,也都是被“主流”看重的史家。有意思的是,缪先生与这些“主流”史家的交往,在初期也往往仍是以诗词唱和及评论为主,直到交往过一段时间之后,讨论史学的记录才逐渐增多。^⑤可知诗文之好正是连接他们之间的桥梁。

三、中国现代学风转移中的“文史结合”

中国现代学术发轫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20世纪30年代逐渐趋于成熟。无论是议题、史料、方法、理论,还是表达和评判标准,以及所依托的制度等,都和传统学术呈现出明显差异,形成了崭新的风格。20世纪以来成长起来的学者几乎无人不受其流风所及,但成色分量又随人不一。20年代起,以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为主的新派学者占据了当时最重要的一些学术资源(发表渠道、研

① 缪元朗《事辑》,第28页。

② 吴宓《吴宓日记》第6册,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14页。

③ 缪钺《自传》,《缪钺全集》第7卷,第172-173页。

④ 关于钱氏在浙大的短期讲学及在此期间与缪钺等人的交流,见钱穆《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211页。

⑤ 缪元朗《事辑》,第43、25、45、73、81、17、39、41、65、69等页。例证甚多,不一一列举。

究机构、学术基金等)，稳居“主流”，也最鲜明地展示了“新学术”的一些特征。在此之外的学者，虽或主动或无意中受此学风沾溉，但与“核心”多少有些距离，表现出某些“另类”的学术趣味，并因各种因素形成多个相异的学术群落。缪钺先生便属于和“核心”有距离的学者。本节将其“文史结合”的主张放在“新学术”的格局中，理解其意义。

首先从文史关系入手。按中国传统，辞章无疑是“学”的一部分，但位阶不高。西汉扬雄即有“雕虫小技，壮夫不为”一说，后世被传为名言。明清以来，在与“学人”对举时，“文人”更被视为一个贬义词。在此意义上，史学地位远高于今日所谓“文学”。不过，同样应注意的是，辞章亦是每个读书人必备的基本功，谈诗论文是士人的集体癖好，经史诸子皆可被当作文辞研习，清代流行的古文选本如《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中也都选入乙部名篇。民初宋育仁在成都办国学研究社，列出“文史学”一科，大体类似时人所言“国文”，而以“史学”属之，盖“‘文’之古谊专属字诂，‘史’之通义兼统夫文词”也。^①皆可看出文史之亲密。一些熟悉传统学问路径的现代学者，也仍把文章之学视作学问根基。陈垣就时对学生说：“不能教国文，如何能教历史？国文不通的人，如何能读史书？”^②

但对一些新学者来说，文史不分，正是史学要走向科学必须克服的障碍。1928年，傅斯年揭示史语所工作旨趣，起首便说：“历史学不是著史”，原因之一就是，著史“每取论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③他后来有一段语气更加斩截的名言：“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作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④文词与艺术是其首先要隔离的对象。1930年代初，一位好发新说的史家卫聚贤也批评中国传统“将史学、哲学、文学三种混在一起”。其实三者本不同：“文章本身的价值是在美，描写一事物，能使人爱看爱读”；而“史学本身的价值是在明瞭事实，使人知道曾有这一种现象，而其事实与文字的好坏，则不管它”。^⑤就连缪先生认为文字别具魅力而在学术史上以诗史互证著称的陈寅恪也说过，“史之能事”在“整理史料”，至“文章之或今或古，或马或班，皆不必计也”。^⑥这一态度亦被一部分治文学的学者接受。夏承焘1940年代初就认为“文家、史家离之双美，合之两伤”。^⑦跟从章太炎研习国故而性好趋新的曹聚仁更幽默地表示文史难以调和：“魏收以文为史，做得焦头烂额，吃力不讨好；前后七子以史为文，削足就履，行不得也哥哥！”^⑧中国现代学界对文史关系的看法，于上可见一斑。

当然，即使在新学者中，文、史被刻意划清界限，也还经历了一个过程。从学科设置看，尽管1913年教育部公布的《大学规程》就在文科里列入历史学，与哲学、文学、地理学并置为四门，但直到1917年，北大才设史学门，1919年改为史学系；其真正发展，更要到朱希祖1920年担任史学系主任以后。其他几个大学的史学系，也都是1920年代才设立的。最值注意的是，朱希祖对北大史学系的改革，目标即是“将文学的史学，改为科学的史学”。而在此之前的1919年，文学门已先将文学史改为狭义，代表了文学的学科独立意识。^⑨

若从具体学人观念看，文史分家的时间要更晚一些，在实践上更是藕断丝连。新文化人是以“文学革命”起家的，胡适、顾颉刚、傅斯年都有专门的文学著述。胡适的“小说史”研究，予新学

① 宋育仁《国学研究社讲习专门学科》，《国学月刊》（成都）第17期，1923年，第42页。

② 牟润孙《发展学术与延揽人才——陈援庵先生的学人丰度》，《海遗杂著》，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93页。

③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页。

④ 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傅斯年全集》第2卷，第308页。

⑤ 卫聚贤《古史研究》，第1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序”，第1页。文章写于1932年。

⑥ 陈守实《学术目录》，转引自罗志田《陈寅恪史料解读与学术表述臆解》，《近代中国史学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96页。

⑦ 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1941年11月16日，《夏承焘集》，第6册，第348页。

⑧ 曹聚仁《报告文学（Reportage）》，《笔端》，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第51页。

⑨ 刘龙心《学术与制度：学科体制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第100-120页。

人以极大启发。顾颉刚参与发起歌谣运动,其关注所在,一头是新文学,一头是新学术(民俗学和方言调查等)。傅斯年1928年在中山大学教书时,也留下了《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和《诗经讲义稿》;而前文中的《史料论略》写于1927年11月,是傅氏系统讨论史料观念的最早篇目。他在其中宣布:“文学史仅仅是通史之一枝”,且文学史的讨论也“时时免不了牵涉到通史中别枝的事”。^①皆意味其认同是在史学一方。而篇中一些议题,诸如《文人的职业》、《儒林》等,确也表明其思考远超后世一般所云“文学”之外。此外,后来以史学名家的徐中舒先生最早发表的论文《古诗十九首考》(1925年)和《五言诗发生时期的讨论》(1927年)也都是文学史的题目。

惟无论如何,二三十年代以后,文史两科各自独立的趋势越益明显,故缪先生这样以一人之力兼治文史的现象,便日显稀见。不过,进一步观察可以发现:文史分途后,出身于文学而能治史学者多,出身于史学而兼治文学者少。缪氏就属于前一情形,此外可举的例子尚多。刘龙心教授根据1937年教育部公布的《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教员研究专题概览》,抽取其中“历史类”研究计划,便有朱光潜《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周作人《日本神话》、庞石帚《史记旁证》等。^②这当然都还可说是介乎文史之间的“擦边”题目。然川大中文系的庞石帚以旧诗人成名,在宋史与明史研究上都取得了重要成绩。^③另一位川大中文系教授龚道耕也有《旧唐书札迻》之作。反之,历史系的学者便很少选择文学课题,即使是被傅斯年宣布为“通史之一枝”的文学史,也不在绝大多数史家的目光内。无疑,从学科独立角度看,史学要更彻底些。

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原因,或与中文系保留了更多的传统治学取向有关。在中国现代大学体制中,中文系是唯一以国别加学科命名的科系,其实际的学术疆界也极具弹性。在史学未独立设系之前,研究历史的教授通常都在中文系。史学系独立后,深受西学尤其是社会科学影响,较为“新潮”,而治学风格更传统的学者大抵仍留在中文系。同样,尽管1920年代学界有不少人认为所谓“国学”即是“史学”(“中国文化史”、“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④但中学里的“国学”课基本由“国文”教员担任,^⑤大学里的国学研究最终归宿也在中文系。^⑥按中国传统学术本有尚“通”倾向,不主分科,在体制上保障了学者更易走向“文史结合”之路,现代史家则受社会科学影响较多,于文学反成弱项。

因此,就中国现代史学与传统学术的联系来说,除了过去大家注意较多的“由经入史”的道路外,^⑦还有一条“由文入史”的道路,也是值得重视的。

进一步的探索可以发现,缪先生的治学道路并非特例。20世纪二三十年代,学术界有一批具有类似经历的学人。此处姑举两例。1920年5月23日,金毓黻在日记中表示预备“一志研究文学,而以史学辅之”。因“文、史二科,界画本不甚严”,加之“文以载事为职,事必资文以传,二者相需甚殷,不可偏废”。另一例是生于1902年的金景芳。他自称从小就有多方面的知识兴趣,惟“家境贫困,又住在乡下,不但没有条件学新科学,并自处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外”。他“做学问是从学做文章开始的。当时的东北,桐城派古文还有广阔市场”,故金氏为学即自桐城派古文始。“学桐城派古文不能不读唐宋八家的文章。后来渐觉唐宋文章多空腔滑调,不如魏晋文章精严。因转而学魏晋人文章。后来渐觉魏晋人文章不如两汉人文章质实,魏晋两汉人文章又不如先秦诸子都讲学术,有内

① 傅斯年:《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傅斯年全集》第2卷,第43页。

② 刘龙心:《学术与制度:学科体制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第277页。

③ 韦兵:《庞俊经史学术述略:兼论蜀学的现代转型与学术取向》,《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④ 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362-363页。

⑤ 缪先生就在保定培德中学讲“国学概论”,又指导学生读先秦经子《说文解字》等。见胡厚宣:《祝贺吾师彦威先生九十华诞》,四川大学历史系编《冰茧彩丝集》,第43页。钱穆《国学概论》也是其教中学时的讲义。

⑥ 直到2002年,中研院成立中国文哲研究所,经学、诸子等皆在其中,仍能看出这一传统的影子。

⑦ 王汎森:《从经学向史学的过渡——廖平与蒙文通的例子》,《近代中国的史学与史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70-101页。

容。最后，我相信‘大文章从六经得来’的说法，因肆力于经学”。^①这段自述生动扼要，使我们清楚看到从辞章到学术的内在驱力。

更重要的是，金景芳也提示了不同地域文化资源对学者学术道路的影响。英人彼得·伯克（Peter Burke）曾说：“一个人的知识和他住在哪儿很有关系。”^②知识分布不均，古今中外皆然。20世纪早期的中国，社会、思想与知识日新月异，资讯传播与交通状况却并未改善许多，文化资源的配置不均尤为严重。“新科学”只在京、沪，其余地方的人要接触它们，都有或多或少的困难。20年代初，东北本被视为保守区域。金毓黻毕业于北大，其时已作了黑龙江教育厅的科长，思路还不出传统文史的藩篱；金景芳生长乡间，新学资源更为匮乏。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好学的年轻人也就只有读古书、作古文。此系传统学问，无论是书籍还是师资，分布都广泛得多，接触更加容易。

保定靠近北京，条件比东北乡下要好很多，故缪氏可以结识吴宓、郭斌龢这样握有重要学术资源的人物，得以接触“新人文主义”，阅读西学经典。但其周围的学术空气，仍以传统文史见长。生长在无锡的钱穆，面临的情形差不多，修学的道路也很类似。他向学生讲“余自动做学问，无师授，引我入门者，乃自读韩（愈）欧（阳修）文始。”^③又说自己“幼嗜文学，得一诗文，往往手钞口诵，往复烂熟而不已”，因此“乃能粗涉四库，稍通经史。凡余之于中国古人略有所知，中国古籍略有所窥，则亦惟以自幼一片爱好文学之心情，为其入门之阶梯，如是而已”。^④这是尤为亲切的夫子自道。由这些事例中我们不难发现，由文入史乃是从传统学术受训出身的学者们走过的一条共同道路。

那么，文辞训练对他们的学术会产生何种影响？前文已据缪先生著作中的某些细节做过一些讨论，主要集中在研究方法上。此处我们可以配合钱穆等人的例子，进一步探讨这一经验对他们史学观念和实践的影响。它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首先是对“人”，特别是“个人”的关注。缪先生晚年说：“研究历史与文学，人是关键。”^⑤言简意赅，乃是一生研治文史心得的结晶。不过这句话过于简练，必须参考另一段较详细的解说：“历史是人创造的，人是活的，有思想感情，有主观能动性。”故史学研究除了注意“当时人的表面活动”，也不能忽视其“内心活动（包括个别历史人物的心情以及一个时代人的共同心情）”，否则“对于历史现象与历史事件的理解就难以深入”。史书多记表面活动，文学作品中才能看到“古人内心深处的思想感情”，“所以文学作品是心声，一个历史人物的文学作品是他一个人的心声，一个时代的文学作品则可以表现这一个时代的心声”。^⑥仍是围绕“心声”展开，而更鲜明地揭示出了“人”在文、史研究中的关键地位：他是支撑这两科的共同基石，亦是这两科的血脉交汇之点。

这一思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一个现象：缪先生著作中，有相当数量的“年谱”，而这些不过是他整个研究计划中的一小部分。1930年代中期，他本打算集合同志，“凡古之诗人已有年谱者，其详核者采用之，不详核者补正之；无年谱者为之撰年谱；事迹简略不能成谱者，为之撰年表。然后择其精要，依年写录，为《历代诗人系年》”，以“为读诗考史之助”。^⑦钱穆也有类似现象：其成名作之一就是《刘向歆父子年谱》，他自己平日亦“喜读古人年谱”，又提示学生读八家文的同时应“参读其年谱”。^⑧按“年谱”之作，在传统史家中极为常见，现代史学却不多睹。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应是，现代史学深受社会科学影响，更关注物质性、群体性、结构性的因素，倾向于低估个人在历史进程中

① 金景芳：《金景芳自述》，高增德、丁东编《世纪学人自述》第2卷，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82页。

② 彼得·伯克：《知识社会史：从古腾堡到狄德罗》，贾士衡译，台北：麦田出版，2003年，第109页。

③ 钱穆：《讲学札记》，叶龙记录，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第49页。他并言：“初学读古籍，不如先读姚鼐《古文辞类纂》。”（同书，第51页）正是据自己的经验而言。

④ 钱穆：《中国文学论丛》，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再序”，第1页。

⑤ 缪钺：《自传》，《缪钺全集》第7卷，第171页。

⑥ 缪钺：《治学补谈》，《缪钺全集》第7卷，第77页。

⑦ 缪钺致刘永济，1943年7月26日，转引自缪元朗：《事辑》，第89页。

⑧ 钱穆：《讲学札记》，第51、65页。

的作用。但钱穆一向认为,中国史学的特点就是“以人中心”。^①此言内涵极为丰富,与缪钺所论可以相互发明,重视年谱自是其中应有之义。

与此有关,他们对于历史现象的个性亦有相当敏锐的体认。钱穆每以“民族、历史、文化”为“三名一体”,且明言“研究历史首先要注意的便是其特殊性”,否则即“不成为历史”,亦无从区别国家民族。^②他更有一妙喻说明写史应首重“国家民族文化发展之个性”:为运动家撰年谱或小传,不能与音乐家之年谱或小传同;在运动家中,网球家的传记,亦不能与足球家的传记同。^③缪氏则对时代之殊异特致敏感。《清谈与魏晋政治》文辨析清谈四期之特点,各各不同。郭沫若《屈原研究》花费大量篇幅论证战国为封建社会开端,借以凸显屈原思想为此时代意识形态的反映,颇受缪氏批评,不惟因其“离题过远”,亦以无法见出屈原特性:“凡讲述战国诸子,皆可加此一大段殷周封建社会论,何独屈原”?更何况殷周社会与古希腊罗马社会本自不同,“未可强相比附”耶?^④这种对历史殊异性的认知自有多种来源,但一定是与其文辞鉴赏和写作经验分不开的:作文最忌千篇一律,彼此混同。^⑤

第二,文辞修养也使得这些学者在历史研究中无法忽视人的情感世界,亦即缪先生所说的“心声”。钱穆在《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一文中,区分了三类史学著述:一是“据正史纪、传、志、表,旁及稗乘、野史、小说、笔记之类”考订“史事”,二是“据文章著作以论一时代人之思想及其议论意见”,而钱穆此文却意在“藉诗文以论其时代内蕴之心情”。^⑥1948年,刘节在一部史学通论性质的著作中,花了很大力气讨论“历史与艺术”的关系。他认为:“历史的叙述,是不能离开感情的。”故反对在史学著作中剔除情感的实证主义式做法:“有人说,历史家不止作考证史料时应该理智化,就是作排比史料时也应多多的养成冷静头脑,这样写出书来,才能使读者自己在这史书里发生作用。我对于这种说法,不能完全赞同。因为历史家对于文化不能没有一种看法,既然有一种看法,便不能不对之发生感情,这才证明这种看法的价值。足见这种感情是经过一番衡量以后才产生的,因此,这种感情是富于稳定性。”^⑦缪、钱二氏更重历史中人物的感情世界,刘节则转从史家着眼,强调史家情感在史学研究中的必要。钱穆又云:“灵感与诗意,有时于研究历史亦大有帮助。”^⑧着眼点相似,而所说更有味。另一个例子是余英时论陈寅恪史学“三变”,以“心史”二字概括陈氏晚年的学术境界。^⑨此二字来自郑思肖,余先生已揭示了陈氏用此典故的用心。这里想指出的是,陈寅恪“心史”阶段的两部大著《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另名《钱柳因缘诗释证》)皆是诗史互证之作,尤与缪氏的“心声”二字应和。

第三个是“了解之同情”的研究方法。通过陈寅恪的著述,此一概念已广为人知,然仍值得再引:“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

① 钱穆说此甚多,此处只举一例,参见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93-113页。

② 钱穆《民族历史文化》,《中国史学发微》,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193页;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2页。

③ 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9页。

④ 缪钺《评郭沫若著〈屈原研究〉》,《缪钺全集》第1卷,第93页。

⑤ 德国史家弗里德里希·梅尼克(Friedrich Meinecke)谓西方历史主义的一个基本元素——“个体观念”的出现即来自“审美感受”。参见弗里德里希·梅尼克《历史主义的兴起》,陆月宏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139页。梅尼克对文学、艺术、美学思想、实践及修养在历史主义兴起过程中作用的讨论,散见全书各处。但我不是要把缪钺、钱穆归入“历史主义者”之列。

⑥ 钱穆《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6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77页。

⑦ 刘节《历史论》,《刘节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70页。

⑧ 钱穆《讲学札记》,第52页。

⑨ 余英时《试述陈寅恪的史学三变》,《陈寅恪晚年诗文集释》,台北:东大图书公司,2011年,第334-358页。

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① 对于此说应注意的有几点。首先，陈氏仍先从史料谈起，与傅斯年等人的问题意识一致；惟陈氏强调，无论史家如何勤奋（“动手动脚找东西”），我们所能看到的都只是历史遗存中“最小之一部”，而史家绝不应安于此片段与枝节，必对其“全部结构”有“真了解”才行。陈寅恪正是在了解“全部结构”的目标下阐发“同情”二字的。其次，陈氏明确提出“艺术家”修养在史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作用，亦有助于对“了解之同情”的性质的了解。

要注意的另一点是，“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一语，似总有西人风味；是否有温克尔曼以降的古希腊艺术史研究在后支撑，殊难臆断。惟陈家确有艺术修养，此经验当然不必全来自西方。且从读书研史的立场看，此论在中国传统中实可找到不少先例。这里仅选取两条缪先生引过的议论。一是朱熹语：“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二是其晚年抄示学生的一段话，出自宋人赵德麟：“尝谓读千载之书而探千载之迹，必须尽见当时事理，如身履其间，丝分缕析，始终备尽，乃可以置议论。若略执一言一事，未见其余，则事之相戾者多矣。”^② 钱穆也引过曾国藩的话：“读史之法，莫妙于设身处地。每看一处，如我便为当时之人，酬酢笑语于其间。不必人人皆能记也，但记一人，则恍如接其人。不必事事皆能记也，但记一事，则恍如亲其事。”^③ 这几条记录，心同理同，在在与陈说印证；赵德麟“一言一事”一语，尤与“残余断片”四字语义相接而互补。或云陈寅恪“了解之同情”一语，出自西哲赫德（或译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④ 是也。惟此处的分析表明，这一观念更应是中西学术传统融会贯通的产物。

我们从缪钺、钱穆的征引中，自然可以看到他们对中国学术传统中此一精神的欣然神会。缪氏在纪念朱自清文中，表扬朱氏虽是新文学作家，“对旧文学亦有同情之欣赏”。^⑤ 钱穆对学生说：“必读其文为想见其人，精神笑貌，如在目前，则进步亦自不可限量矣。”^⑥ 二人都讲“读文”，也再次提示我们辞章修养在此二人的史学研究中起到的支援作用。受此训练，也自然倾向于从历史情境本身理解历史，而不是以一外来尺度衡量。比如，郭沫若曾指责屈原在秦兵入郢之后没有领导民众以作死战，缪先生便颇致微词，谓此一苛刻“未免将屈原过于现代化矣”。^⑦

钱穆在引用过曾国藩论读书的话后，并专辟一节，讨论曾氏的“诗古文之学”。他认为，桐城派“主诗文以声调为本”，实是“主以声调探取性灵，从此使读者精神与作者精神相契合，此乃从文学上的探求来接触古圣贤的心情，使读者与作者呼吸相应，不啻同堂而观面”。曾国藩在钱穆成学道路中，起过路标作用，钱氏自己走过此路，说来亲切动人。而尤应注意者，钱穆云，此一方法与汉学派“从训诂考订上来认识圣贤真理者，其实也是各得一边，双方未见有十分的高下。所以桐城派古文家在乾嘉朴学极盛时代，终还有其相当的地位”。^⑧ 将二者做一持平之论，而语气更落在为桐城古文辩污上。这里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自清代乾嘉学术直到现代史学的“新考据”风气下，桐城派的意义皆被主流学者低估了。而这段话也不能不令我们想到以追求“科学”为目标的现代史学，钱氏此论不只是讲古，亦应是论今。

第四是注重历史中“意义”的发掘，而不满足于一点一滴的名物考据。缪先生极重考证，然早年就谓校订训诂“乃学术之蘧庐，可一宿而不可久留，纵研之至深，不为造极”，在清儒中乃以戴震、章学诚之学为最优。后又对“清人治《文选》者，多注意于声韵、训诂、名物、典制诸端”表

①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279页。

② 缪钺：《治学琐言》，《缪钺全集》第7卷，第75页；景蜀慧：《殷殷滋兰意》，四川大学历史系编《冰莹彩丝集》，第81页。

③ 钱穆：《近百年来诸儒论读书》，《学龠》，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年，第98页。

④ 陈怀宇：《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20-354页。

⑤ 缪钺：《考证、批评与创作——敬悼朱佩弦先生（自清）》，《缪钺全集》第7卷，第109页。

⑥ 钱穆致叶龙，参见钱穆《讲学札记》，第66页。

⑦ 缪钺：《评郭沫若著〈屈原研究〉》，《缪钺全集》第1卷，第93页。

⑧ 钱穆：《近百年来诸儒论读书》，《学龠》，第103页。

示不满,“拟用文史互证之法研究《文选》中诸名篇,论其旁涉之意义,发其隐微之旨,或可为‘选学’开一新途径”。^①都可看出他要超越单纯的名物训释,在“意义”层次把握史料价值,而此认知也应与其辞章训练分不开:任何时候,对一篇文章的理解,都离不开对其中字汇的认知,但文章意义的获得又绝不靠一个个词义的简单相加,而必须视之为一个整体,才会呈现。换言之,“读书必先识字”,而“识字”并不就是“读书”;“读书”须建立在“识字”之上,又是单纯的“识字”无法替代的。此层意思,钱穆亦有指点:“必精熟文理,乃知孰者当考,乃知所考之孰得其是而无疑,固亦非字字而详、句句而寻者之所与知也。”^②

除史料的“意义”外,历史“意义”还有一层更高指谓,即“文化意义”。这一点和前边几个特点形成了一个逻辑链条,是前几点的必然归宿。因为重视“人”,而要进入人的内在世界,便必须通过“了解之同情”的方法,“人类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③对人的内在世界的理解必定要归结为对其“意义之网”的理解。钱穆抗战期间指责“科学派”史家治史“缺乏系统,无意义”;“往往割裂史实,为局部狭窄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换为死的材料”;“既无以见前人整段之活动,亦于先民文化精神,漠然无所用其情”,^④将这几层意思间的逻辑关系清楚展示出来。缪先生从未如此直接批评过“科学派”史家,但刘节日记中曾记他和缪钺的一次谈话,谓“彦威赞成英国文化,因其接近于人文主义。余则赞成德国民族之特性,以其富于研究精神”。^⑤赞成人文主义,固然有受吴宓、郭斌龢影响的成分,但其天性中的传统士人修养应是此论最重要的根基。事实上,无论是文学还是史学,在缪先生那里,也都是自觉地在“文化”高度上理解的。^⑥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最后一点:不同的治史方法和对文辞的不同态度,也和学者对待传统文化的不同态度有关。缪先生的天性、家学、师友夹持等,皆使其对中国文化抱有一种深挚同情。他当然知道中国文化有不足,尤其缺乏两点:一是思想上的“逻辑严密”和表达的“曲折精细”,二是“不问目的如何、实用与否,而但研究事物之本性”的精神。因此,他期望“中国可以产生纯逻辑、纯哲学、纯科学”。而要弥补这些不足,就必须向西方文化学习。他甚至主张,翻译文字“可以相当欧化”,惟须尽量采用“中文适当之句法、精切之成语”,收到“以中国文章表达西洋思想”的目的。^⑦他晚年为郭斌龢译《理想国》写序,也专门虑及文体问题,决定采用“吾辈平日所蕲向之‘新文言’,保存传统文章中之‘雅言’与情趣,而又融合西欧近日文章中严密之逻辑与灵活之句法”。^⑧整体看,缪氏对中国文化的态度与吴宓等极为接近。^⑨一言以蔽之,即是“批判地接受旧文化以创造新文化”。^⑩

这个态度使其更接近章士钊、张尔田、王国维、陈寅恪、吴宓、郭斌龢、钱穆,以及陈槃、劳幹、朱自清等人。除了前边的几位前辈外,吴宓以降的几位大都是其诗友。尽管他们在学术上的趋新程度不一,但对中国文化都具有一种“温情与敬意”(钱穆语),而这种态度和他们对中国的深厚的诗文传统的亲切领会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萧公权曾言,荷兰汉学家高罗佩(Robert Hans van Gulik)可以写“典雅工整、出色当行的旧诗”,那么,“我这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更不妨大着胆子尝试一下了”。^⑪“尝试”二字,使人想及胡适的《尝试集》,而二人对旧诗的态度则恰好相反。萧氏是否有意用典以微讽白话文运动,无法深究,但至少使我们看到,写旧诗这种行为的背后,确有一种明确的文

① 缪钺致章士钊,1927年2月21日;缪钺致陈槃,1947年3月3日,均转引自缪元朗《事辑》,第10、115页。

② 钱穆《韩文导读序》,《新亚遗泽》,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第704页。

③ 克利福德·格尔兹(Clifford Geertz)述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语,转引自余英时《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4年,第7页。

④ 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上册,第3-4页。

⑤ 刘节《刘节日记》,1939年9月19日,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第145页。

⑥ 缪先生曾言:“文史结合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参见缪钺《治学琐言》,《缪钺全集》第7卷,第74页。

⑦ 缪钺《评贺麟译斯宾诺莎〈致知篇〉——兼论翻译》,《缪钺全集》第7卷,第135、138、140页。

⑧ 缪钺致郭斌龢,1984年1月6日,转引自缪元朗《事辑》,第332页。

⑨ 缪钺《回忆吴宓先生》,《缪钺全集》第7卷,第124页。

⑩ 缪钺《考证、批评与创作——敬悼朱佩弦先生(自清)》,《缪钺全集》第7卷,第108页。

⑪ 萧公权《问学谏往录》,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183页。

化认同意识在。

显然，古典诗文的修养早已渗透入这些学人的整个生活中，使其绝不肯与传统一刀两断。在此，我打算引用王汎森教授论钱穆的一段话，对这批学者的共同文化倾向做一概括：“他基本上是透过吟咏古人文章，逐步进入古人的心境的，理解古人的心灵与境界，所求的是一种古今的时间连续感，这些传统对他而言是活的（living past），故他显然反对站在外面加以‘重估’或‘评判’的态度。”^①如我们的观察表明的，这里的“他”，其实是“他们”。

总之，本文希望通过缪钺先生这一个案，说明传统诗文修养对现代史学研究所起的“支援”作用。需要解释的是，此处所用“支援”二字，与科学哲学家普兰尼（Michael Polanyi）提出的“支援意识”（subsidiary awareness）概念有密切关系。这一概念的大意是，学人通过长期接触学术史上那些伟大“典范”，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一种“可以意会而不能言传的知的能力”。至于我们治学过程中清晰自觉到的那部分意识则被他称为“集中意识”（focal awareness）。它们共同推动了知识的创造，但“支援意识”的“无声”作用更为关键。^②根据这一原理，我们也可以发现，缪钺、钱穆等人在成学道路中对文辞传统的浸润熏习，早已结构性地进入其心灵深处，于不自觉间对他们的运思起到决定性作用，使其形成一种特殊的学问风格。特别是“了解之同情”的方法，与“支援意识”的形成如出一辙，实可视为“支援意识”的自觉化。

在此基础上，我们也可以回答目前中国学界的一个追问：今日很多学人意识到，这一百多年来的中国学术另辟途径，与传统道路越来越远，从问题意识、理论工具、研究方法，到最后的结论，一味逐人牛后，全如鹦鹉学舌；因而希望重新接续中国自身的学术脉络，使其再度“活”起来。对此，包括缪钺先生在内的这批学者提供了一个重要启示：我们必须首先回到那个深厚的文辞传统中，通过“吟咏古人文章”，重新“进入古人心境”，在此基础上慢慢体会“中国自身的学术脉络”是什么，才谈得上“复兴”二字。

From Literature to History: How the Exquisite Diction Supports Modern Historical Research in the Case of Miao Yue

Wang Dongjie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4)

Abstract: The academic style of Miao Yue is known as “combining literature with hist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research, the core of “combining literature with history” is that diction should be considered a research tool (rather than historical data). In the separat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odern academic researches o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Miao’s academic style is not in “mainstream”; yet it is by no means a special case. A lot of cases from a group of scholars with a similar experience show that, in the significance of correlation between modern history and traditional history, there is another path “from literature into history”, besides “from Classics into history”. The profound diction accomplishment supports their historical perception and practice in five aspects: paying attention to “human being”, focusing on emotional world of human being, the research method of “understanding sympathetically”, exploring the “meaning” of history, and keeping the tender feeling and respect for traditional culture.

Key words: the combination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from literature to history, modern academic research

（责任编辑：史云鹏）

① 王汎森：《钱穆与民国学风》，《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第146-147页。

② 参考林毓生：《中国人文的重建》、《一个培育博士的独特机构：“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增订本），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第28、340-341页。